

滋养·转化·延绵：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承关系

李小婵（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摘要：作为师长，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培育，堪称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育人典范。沈从文对汪曾祺产生的影响，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：第一，以“耐烦”精神滋养其人格智慧；第二，以“沈氏”技法启迪其创作范式；第三，以教学薪火示范其为师之道。这一师承过程诠释了教师影响力的本质，即精神感召、方法引导与人格示范的有机融合。这为当代教育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同时，也重新审视和定位教师作为启迪者、引路人与守护者的核心力量提供了启示。

关键词：沈从文；汪曾祺；师承关系；教师影响力

当“把课堂还给学生”的口号日渐成为教育界时代最强音，教师角色的价值与影响力正面临被弱化的风险。当前关于教师影响力的研究，或依托现代教育理论探讨策略，或聚焦高校教师作用机制，却较少从教育本质出发，挖掘具体师生交往案例的深层启示。现当代文学史上，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承，因其跨越时空的典范意义，恰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。本文聚焦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，这一影响过程展现了精神的滋养、创作的转化与教学的延绵，彰显了师者力量的重要性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汪曾祺在承继师泽的同时，更带着鲜明的主体性开创了新的境界，完美诠释了“传”与“创”的辩证统一。因此，深入剖析这一经典案例，有助于警惕矮化教师角色的认知误区，在“去权威化”的浪潮中重新定位教师角色。

一、“耐烦”精神的滋养

“耐烦”作为沈从文精神人格的核心特质，经由“言传身教”，深刻烙印于汪曾祺的创作实践与生命轨迹。这种师承绝非技艺的简单传递，而是生命智慧的深层滋养。它在汪曾祺身上表现为两个方面：在文学事业上，凝练为实证主义的创作精神；在人生境遇上，升华为随遇而安的豁达智

慧——这并非简单的“耐心”二字可以概括。

（一）实证为基的创作精神

沈从文将“耐烦”精神浇筑于文学教育，其核心在于倡导一种扎根生活、精微观察的实证主义创作方法论。这种强调细节的训练，夯实了汪曾祺的创作根基，成为其作品真实力量的内在源泉。

在西南联大教授期间，沈从文重视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中汲取养分，主张“用脚步丈量土地，用眼睛记录生活”。他曾多次带领汪曾祺等学生深入昆明周边乡镇、市集进行实地观察，要求学生通过观察市集百态、自然风物，记录方言俚语、风俗人情，建立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认知。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下，汪曾祺实现了“耐烦”在其作品中的深度渗透。例如，《受戒》里对荸荠庵宗教仪式的描写，是源于对江南水乡宗教生态的细致观察；《大淖记事》中对锡匠行业工具、劳作场景的刻画，非长期观察难以实现；《故乡的食物》系列散文对茨菰、高邮鸭蛋、各种野菜等地方风味的性味、形态、做法的记录，精确到几乎“植物志”“食谱”的程度——这正是“耐烦”的实证精神在文学中的呈现。

“耐烦”在创作精神上的渗透，使汪曾祺的作品既保有沈从文式对生活的虔诚信仰，又发展出

独特的美学品格。从西南联大的田野课堂到高邮水乡的文学书写，两代作家以躬身实践证明：唯有以“耐烦”之心扎根现实土壤，文学方能生长出力量。

（二）随遇而安的生命智慧

“耐烦”精神更深层次的体现，则在于汪曾祺面对人生逆旅时，所展现的“随遇而安”的豁达境界与韧性智慧。这不仅是应对困境的策略，更是一种主动将苦难审美化、于困厄中发掘生命意趣的生存哲学，彰显了对“耐烦”内核的超越。

沈从文在建国后遭受了巨大政治压力、被迫搁置心爱的文学创作时，选择以惊人的“耐烦”默默转向文物研究，在“坛坛罐罐、花花朵朵”中开辟新的精神家园。汪曾祺在农业科学研究所期间，其应对方式堪称对老师精神的呼应，却更具有其个人特色。他主动以“耐烦”的态度去拥抱、观察，甚至品味这段非常岁月——他潜心研究马铃薯，画出了详尽的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；他细致观察葡萄的生长，积累了后来《葡萄月令》的素材；他与农民同吃同住，并将这段经历在《随遇而安》中称为“真是神仙过的日子”^[1]。这种在苦难中发掘生活意趣，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体验，以坚韧平和化解困境的态度，正是沈从文“耐烦”精神中那份坚韧内核，在汪曾祺身上升华为一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、积极豁达的生命智慧——随遇而安。

由此可见，“耐烦”绝非沈从文作为师长留给汪曾祺的一句空洞的教诲，它塑造了汪曾祺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严谨，练就了他面对人生风雨的豁达。这份珍贵的师承，经由汪曾祺的生命体验和创造，最终化为了他温润平和、坚韧深沉的人格底色，成为连接两代文学大师最坚实的精神纽带。

二、“沈式”技法的转化

早期，汪曾祺的文学观囿于传统话本、通俗文学。然而，沈从文独树一帜的文体范式，拓宽了汪曾祺的视野——在结构上，“有故事而无情节，有意境而无冲突”的散文框架；在语言上，

“土而不粗、雅而不涩、情而不滥”的诗化书写；在内容上，“重本真轻功利，尚自然反规训”的地域叙事。汪曾祺对此的师承，绝非亦步亦趋的模仿，而是立足于自身气质与江淮地域文化底蕴的创造性转化，在结构、语言、内容三个方面开创了“汪式”的特色技法，其核心在于对“散”与“全”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，以及对市井生活本真状态的挖掘。

（一）结构去中心化

汪曾祺在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一文中对外界评论的“沈从文小说不讲结构”，作出了回应：沈从文早期小说是散漫冗长的，但后来大部分小说是讲究结构的。受此影响，汪曾祺的作品也呈现了沈从文所讲究的“匀称感”。有学者尝试归结为三种类型：“树枝状结构”“云朵式结构”“画簿式结构”^[2]。本文在此基础上，对这三种特征进一步阐释——“散”的表象下是对“全”的追寻。

首先，“树枝状结构”的“散”表现为：开篇抛出核心人物或事件（“树干”），随后转向风俗、场景等支线描写（“枝叶”），最终回归主题。如《陈四》等作品，从陈四这一人物核心（“树干”）延伸至迎神赛会的锣鼓程式、高跷技艺的细节铺陈（“枝叶”），民俗描写占比远超人物直接刻画，形成“散漫的风俗狂欢”。这种风俗枝叶的“散”实为对民俗细节的“全”投射，在民俗细节的铺陈中，人物的轮廓逐渐清晰，因此该种结构的“全”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氛围中隐秘生长。

其次，“云朵式结构”意味着叙事如“云游”，在市井琐事间随意停泊，人和事如云朵般偶然汇聚。如《鸡毛》平行描写不同人物故事，最终通过一处微小焊点（鸡毛）建立勾连，其人物与事件之“散”是为精神两极之“全”服务。此外，《鸡毛》未写金昌焕如何偷文嫂的鸡，对文嫂被偷鸡后的生活也不展开描述，这云朵间的留白，恰恰呈现出了“被侮辱与被损害者”的集体沉默——以不写之写，完成对人性复杂的整体认知。

最后，“画簿式结构”的核心特点在于将独立成篇的片段组合成册。如《羊舍一夕》共六个部分，其中第二、三、四部分可以离开整体而单独存在；《岁寒三友》《故里三陈》中的人物也是独立成章、各有悲欢。正如汪曾祺的文体宣言“小说应如散文，各章自有境界”，这些可以单篇成诵的生命册页，在文化气韵的统摄下，拼贴成时代的精神“全”景。

（二）语言“水”化

从“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”到“用普通的话，说普通的人事”^[3]，与沈从文小说语言的乡土味有别，用“泱泱水气”来形容汪曾祺的语言特质更合适。这种“水”化特质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其一，体现在“水纹式”的方言渗透。不同于沈从文以方言为刀笔，在《边城》中刻下“催送”“悖时砍脑壳的”等符号，将“茶峒”等名物转化为乡土文明的密码，试图构建起抵抗现代性冲击的语言隔离区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障碍。汪曾祺是以方言为水晕，在《受戒》中撒下“格铮铮”“滑滴滴”的细碎声响，能够引发“涟漪式”的文化联想，让“尿碱汤”“车螯”等词汇褪去文化光环，仅作为人物活动的生活注脚。《大淖记事》中巧云“泱泱（洗）衣裳”“乌不溜秋的辫子”等表达，既保留苏北方言的质感（“泱泱”音近当地方言“漾衣裳”），又通过字形改造（“泱”替代“漾”）赋予生活韵味。这种方言运用如溪涧中的卵石，虽承载地域文化，却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融入日常交流，本质是文学从“文人趣味”向“生活活水”的回归。

其二，体现在“水滴式”的细节印真。以《异秉》中熏烧摊主王二与顾客的对话为例，“您来点什么？——老样子，半斤猪头肉”^[4]，看似平淡，却暗含市井交易的节奏感，营造了生活在同一场域的亲近感。此外，《端午的鸭蛋》中“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^[5]，以拟声词和动作细节替代象征，将沈从文的“抽象的抒

情”^[6]落地为可感知的生活切片。这就与沈从文用语言构建的隐喻不同，汪曾祺在“贴着人物来写”基础上更进一步，把日子写得真实，渗透着汪汪水感。

其三，体现在“水温式”的情感流动。与沈从文的冷峻与深哀不同，汪曾祺用温爱的笔触谱写小人物的篇章，其语言也实现从“冷寂凝视”转向“温热共情”。《边城》中，翠翠祖父去世的场景以“老船夫把那个葫芦装的酒，从从容容地喝了一口”^[7]的平淡笔触写就，看似冷静的白描背后，是对传统生活方式消逝的无声哀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冷寂是“冷眼看生死”的庄重，并非冷漠。然而，汪曾祺更习惯以温热溶解生活的辛酸——《受戒》中明海与小英子的对话：“我给你当老婆，你要不要？”^[8]以直白的口语打破传统小说对诗意的追求，让初恋的轻甜如溪水漫过读者心头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温热不是煽情，而是柔和安静的爱。

（三）内容市井化

在《我的老师沈从文》中，汪曾祺坦言：“看了《猎人日记》和沈先生的小说，发现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，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，是可以这样写的。^[9]”这句自白揭示了一个根本性转向——沈从文以《边城》《萧萧》等作品，将文学目光从庙堂英雄转向市井凡夫，这种草根美学的启蒙，直接扭转了汪曾祺的创作内容。

这种影响显著地体现在题材对象的本土迁移上。沈从文聚焦湘西吊脚楼，书写《丈夫》时，以独特湘西场域承载市井故事。汪曾祺深受其启发，将目光锁定在自己熟悉的江淮地域。在《大淖记事》中呈现高邮大淖边锡匠与挑夫的相濡以沫，他并未简单复制湘西模板，而是完成了关键性的本土转化。

另一创造性发展，在于人物塑造重心的转移。沈从文笔下人物常带“乡下人”特质，《萧萧》里童养媳天真混沌，蒙昧与神性杂糅，体现湘西文

化滋养出的原始生命状态。而汪曾祺则更突出市井人物的“专业尊严”与生活智慧。《大淖记事》中锡匠“榔头敲得极有章法，丁丁当当像唱戏的板眼”，手艺的精湛成为其人格尊严的外化；《鸡鸭名家》里的陆长庚凭借“一甩竿子就能叫鸭子排队”的本领，展现出市井行当里隐藏的非凡智慧与职业精神。汪曾祺通过聚焦人物在各自行当中的技艺与操守，让江淮市井人物凭借其职业闪光，超越了沈从文模式中地域文化决定论的色彩，创造起根植于高邮本土、更具普遍烟火气的市井生态与人文景观。

更进一步，汪曾祺将沈从文对“健康、优美、自然”生命形式的追求，具体为对日常市井生活本身的审美化。他比沈从文更热衷于发掘和描绘市井生活的细节之美、人情之常、滋味之真。《受戒》中荸荠庵和尚们杀猪、打牌、娶妻的世俗化日常，《异秉》中王二熏烧摊子的烟火气与市井生存哲学，《鉴赏家》中叶三与季匋民跨越阶层的艺术知音之交，乃至《岁寒三友》中小城手艺人的悲欢与坚守——这些再平凡不过的生活场景、劳作细节、邻里交往，在汪曾祺笔下都焕发出诗意和尊严。他将普通人的尊重，落实为对普通人具体生活情趣、生活智慧的由衷欣赏与审美升华，形成了其充满生活烟火气的独特美学风格。沈从文的“静观”叙事，常带着距离感和淡淡的哀愁，汪曾祺的“温情”则是发自内心的认同、融入与守护。

三、教学薪火的延绵

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教育实践之所以影响深远，不仅在于其将独特的文学理念注入汪曾祺的创作血脉，更在于其具体而微、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论，为汪曾祺日后为师树立了典范。这种薪火相传主要体现在：在教学方法上，躬身践行“于做中学”，强调习作、聚焦观察；在育人态度上，彰显“人师风范”，尊重个性、积极举荐。

（一）于做中学

沈从文的教学核心在于引导学生“做”而非

仅仅“听”，这绝非空泛理念，而是体现为两大核心操作：以高频写作为教学轴心、以聚焦观察为教学根基。二者共同构筑了摒弃空谈、知行合一的创作教育范式。

“做中学”体现在以习作为核、高频实践。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设的创作课，名称为“各体文习作”或“创作实习”，旗帜鲜明地将写作实践置于课程中心。他坚信“写的比讲的多”，理论知识必须通过大量的写作练习才能内化。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这一理念，无论是早年在西南联大附中，还是后来在北京市文联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单位指导青年作者，他都将学生的实际写作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。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期间，他要求学生进行高频次的写作训练（如要求每周完成散文或短篇小说习作），营造一种“在做中学”的氛围。这并非简单的题海战术，而是旨在通过持续的实践，让学生感悟语言、结构、人物塑造的奥秘，从而真正掌握写作技巧，摒弃了单纯的理论灌输。

“做中学”要求学生聚焦观察、寻找“发现”。沈从文重视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，并视其为创作的源泉。在西南联大执教过程中，他常会布置具体的观察性习作题目，例如“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”“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”。这些题目具体、微小，旨在训练学生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，如同制造需精通零件，写作业需先扎实掌握描写具体事物、瞬间的基本功。汪曾祺深刻理解这种训练的价值，因此他在教学中也会设计具体而微、富有启发性的观察性命题，如让学生描写“菜市场的喧嚣”或“一个手艺人工作的瞬间”。这些题目引导学生将目光从宏大抽象转向身边具体，培养其敏锐的观察力与精准的表达力，这正是沈从文“生活即教材”理念的延续。

（二）人师风范

超越传授技艺，沈从文与汪曾祺为师之道最动人的光辉，在于其人师风范——在精神层面，

尊重个性，守护学生创作自由；在行动层面，积极举荐，搭建学生后生平台。

一方面，尊重个性，守护自由。沈从文虽强调基本功和“贴”，但反对用任何固定模式或主义“套子”去框住学生。他欣赏汪曾祺早期带有现代主义探索色彩的小说，并给予鼓励——在1941年给施蛰存的信中，沈从文提到“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，很有几个好的。有个汪曾祺，将来必有大成就”，当时汪曾祺尚在西南联大求学，还处于创作的起步试笔阶段，沈从文却能独具慧眼，给予如此高的评价。汪曾祺在教学和提携后辈时，同样秉持“兼容并蓄，尊重个性”的原则。在教育观上，他融合传统与现代，深信教育应激发人的自由精神，从不主张教条式教育；在文学观上，他认可语言的开放与独创性，也对各种文学现象与体裁包容看待，如认为小说可“有意思，好玩儿，叫人喜欢”。受西南联大求学时兼容并包、崇尚自由的学术氛围熏陶，他也养成了率真、自然的精神气质，鼓励作家找到适配的表达，即“找到自己的声音”。

另一方面，积极举荐，搭建平台。沈从文对学生的关爱体现为切实的行动，1947年，《沈从文致李霖灿、李晨岚》的信中写道“我有个朋友汪曾祺，书读得很好，会画画，能写好文章，在联合大学国文系读过四年书”，并请求朋友为汪曾祺找工作。此外，汪曾祺的许多早期作品正是经沈从文之手得以面世，这对初涉文坛的年轻人是莫大的鼓励和机遇。因此，汪曾祺同样不遗余力地，为有才华的学生和青年作者创造发表机会，如在看到业余作者车军的短文《爱是一束花》后，不仅写五百字短评，还邀林斤澜、邵燕祥一起写，助力其作品传播。他深知年轻作家脱颖而出不易，不顾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序”，为专业和业余作者写序言、书评，如生前绝笔《铁凝印象》，还认为年轻人写序、鸣锣开道是“应该、值得”的，传承了沈从文等前辈提携后进的精神。

四、结语

沈从文与汪曾祺的代际传承，诠释了教师影响力的深层内涵：以“耐烦”精神滋养人格，借“沈氏”技法启迪创作，凭教学薪火延绵师道。尤为可贵的是，这段师承关系既非权威的单向灌输，亦非学生的被动接受，这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尤为深刻：其一，跳出功利化培育的窠臼，引导学生沉淀心性；其二，打破机械性模仿的桎梏，鼓励学生创新突破；其三，摒弃权威性压制的藩篱，助力师生双向成就^[10]。三者共同指向沈从文与汪曾祺的相处之道，为破解“教师角色弱化”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突围路径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汪曾祺. 随遇而安[M]. 北京：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，2019：53.
- [2] 耿红岩.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与文体[J].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，2008（1）：69-72.
- [3] 沈从文. 从文自传[M].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0：112.
- [4] 汪曾祺. 异秉[M]. 兰州：读者出版社，2023：31.
- [5] 汪曾祺. 端午的鸭蛋[M]. 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5：10.
- [6] 胡国威. 论沈从文“抽象的抒情”[J].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09，9（1）：73-76.
- [7] 沈从文. 边城[M]. 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8：84.
- [8] 汪曾祺. 受戒[M]. 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23：251.
- [9] 汪曾祺. 我的老师沈从文[M]. 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9：89.
- [10] 孙永敏，孙银光. 从权力到非权力：教师影响力的实践路径[J]. 当代教育科学，2020（10）：56-62.